

童大林 著

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目次

优先解决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1）

走城乡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道路.....（5）

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12）

新商品简论.....（15）

对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评介.....（17）

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扫清道路.....（27）

珠江三角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摇篮.....（30）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珠江三角洲的成功实践.....（34）

苏锡常：一个世界性的区域市场.....（45）

山东半岛：“逐鹿”太平洋，进军世界大市场.....（50）

太平洋上的金冠.....（58）

海南之梦.....（62）

中国大陆将现“四小龙”.....（66）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的现代城市
——常州..... (69)

从浙江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 (83)

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方式..... (89)

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是城市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92)

股份化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新基点..... (102)

寄希望于企业集团..... (109)

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重商..... (112)

大生产 · 大流通——大市场..... (119)

对现代市场的几点看法..... (123)

搞活农村市场..... (125)

开拓技术市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128)

让社会主义企业家涌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131)

企业家决胜在市场..... (135)

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问题..... (138)

利益的合理分配..... (147)

供求不平衡规律与经济周期..... (158)

大经济 · 大科学 · 战略科学..... (162)

优先解决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一九九一年三月）

在80年代，由于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胜利地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10亿人民大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一个历史奇迹。90年代，我们仍然必须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保证第二步战略目标，即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的实现。

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实际上就是要优先解决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在政治上，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上，从片面地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转移到解决温饱问题和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从只抓生产转移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齐抓。这都是战略性、方针性的大转变。

我们知道，优先解决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并不是不重视发展重工业。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现代化。重工业是现代化的基础。我们也知道，要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离开了发展农业、工业、商业和各行各业，就是一句空话。但

是，再不能像过去曾经做过的那样，为工业而工业，为企业而企业，为产值而产值，把提高人民生活置于不顾。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只能是为了在解决全体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不断地和逐步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现在，“生产为消费，消费促生产”，消费和浪费不能划等号等观点，也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了。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区别“经济增长”和“发展”这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

所谓“经济增长”，是表示一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的产量的增加，它主要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来衡量。

“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不但包括经济增长速度，也包括经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变化和进步。

所以，增长决不等于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大部分被少数人所占有，大多数人所得甚少。如果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每年增长2%，但只有20%的人提高了生活水平，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几乎很少变化，这就不能叫做“发展”了。

社会主义制度一个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必须在全社会进行比较合理的分配。尽管不同的个人、阶层、行业的所得必然会有所差别，不能搞平均主义，但是也不能过于悬殊。特别是必须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也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经过10年改革开放，我们全体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已经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呢？

据调查，在一些方面，我国人民生活高于发展中国家

的平均水平。

营养方面。1985年我国每人每天食物热值为2620大卡，高于发展中国家2460大卡的平均水平，接近2694大卡的世界平均水平。1979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粮食仅207公斤，只比1952年多14公斤；1990年升到385公斤。11年增长数是过去27年增长数的12.7倍。

穿的方面。50年代初期，实行棉布凭票供应，每人每年4—6米。1983年12月政府宣布取消布票。1986年我国人均纤维消费量为10.6公斤，高于发展中国家3.8公斤的平均水平。如今，遍布全国城乡的花团锦簇的服装市场，对外国人，特别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来客，谁见了不眼花缭乱呢？

住的方面。10年间全国新建住宅77亿平方米，其中农宅62亿平方米，共有8600万农户迁入新居。

用的方面。1988年我国每百人拥有电视机13.2台，洗衣机6.2台，电冰箱1.8台，相当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医疗保健方面。1988年我国拥有医生162万人，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为676人。

改革10年，我们虽然着重解决了人民生活问题，但重工业并没有萎缩，相反地，由于有了广阔的市场而更加发展迅速了。钢突破了年产6000万吨，煤突破了年产10亿吨。其它生产资料的生产也相适应地大大发展了。

现在越看越清楚，无论我国（各个省、市、地区、所有的城市和乡村），或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包括那些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生活疾苦，不努力提高人

民生活质量，或是老百姓日子不好过，过不下去——人心不顺，民情不稳。那么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命运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关于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范围很广。根据我国人民生活现状，应该进一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温饱问题（在贫困线以下的，以及相当一部分目前还只是勉强够到较低质量的温饱水平的）；二、住宅问题（城市主要是居住条件仍然很差的人以及相当广大的农村）；三、医疗问题（这方面，广大群众反映强烈）；四、教育问题；五、社会保险问题；六、社会设施问题（如水、电、燃料、交通、电讯等）；七、社会治安问题（这个问题抓不紧可能越来越严重）；八、社会公德问题（广大群众多么渴望有新型的优良美好的人际关系）。

前几年，有一个国际会议向联合国提出一份报告，认为过去40年中，许多国家极少注意人的需要，人的忧虑，人的发展。他们建议，90年代的国际发展战略，应该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把重视人民生活作为第一位的发展战略，使人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主要受益者。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不是更应当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吗？

我们在80年代基本上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正是把人——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放在优先地位，通过改革开放，发挥了人——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全体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国力也增强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光明前景。这是极为宝贵的实践经验。90年代，我们还必须这样做，并且做得更好。

走城乡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一九九〇年三月）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是以剥削农民与掠夺殖民地
为特征的。直至今日，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仍对经济落后国
家的农业、矿业及其初级产品进行掠夺式的国际贸易。这
就是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最大不平等。

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过分强调优先
发展重工业，并以农业的“原始积累”方式来实现工业化，
从而使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城乡悬殊难于泯灭。

我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抓了农村改革——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调整农产品价格，建立农贸市场，兴
办乡镇企业。因而，短短几年时间，农村贫困面貌迅速改
变，大体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农村改革成为整
个体制改革的第一推动力。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村一大奇
迹。城市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发展横向联合，形
成各类市场，运用宏观经济手段等等。于是，工业迅速发
展起来了，中小城市也纷纷崛起。全国出现了一种城乡共
同发展的新面貌。

不容讳言，10年来我国农业和工业的共同发展，有过曲折。

我们拿1980—1989年全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总产值增长指数（与上年比较）来看。这10年，可分为四个阶段：

年 份	农 业	轻工业	重工业
1980	1.4%	18.9%	1.9%
1981	5.8%	14.3%	—9.55%
1982	11.3%	5.8%	9.9%
1983	7.8%	9.3%	13.1%
1984	12.3%	16.1%	16.5%
1985	3.4%	22.7%	20.2%
1986	3.4%	13.1%	10.2%
1987	5.8%	18.6%	16.7%
1988	3.9%	22.1%	19.4%
1989	3.3%	8.4%	8.2%

从上面数字看来，头两年工农业尚处于恢复阶段。1982—1988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走上比较协调发展的阶段。这几年，改革顺利，老百姓日子开始好过。1985—1988年，由于种种原因，农业徘徊不前，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1989年至今工农业增长速度同时下降。

这种情况告诉我们什么呢？

长期以来，我们是把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目标，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实际工作中，工农业也在互相支援。尽管如此，工业和农业仍然是两条平

行的路线。往往是顾此失彼，重此轻彼，或各搞各的，因而都吃了苦头。

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国家里，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始终占居第一位。中国农村市场，将是世界上一个最大市场，它的兴衰，不但会决定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进程，也会影响世界经济的动向。同时，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人们也知道，中国千百年来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所以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状况极不平衡。这些国情，要求我国必须走一条新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既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又区别于过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就是：农业必须面向工业，工业必须面向农业；城市必须面向农村，农村必须面向城市；工人和农民都成为现代知识劳动者大军。

当前，要调整产业结构，首先应该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工业内部和农业内部的关系。具体地说，农村和农业必须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充分的农产品和扩展购买工业产品的农村市场；城市和工业必须大力支持农村建设，为其提供必需的商品、资金、人才和科学技术等等。

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需要上下左右、各方各面协同动作。

为抛砖引玉，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立强大的农用工业和农用产品的生产体系。当

前，农村迫切需要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农膜和各种适用的农业机械等）、建筑材料、交通运输工具（如小型的农用装载汽车），以及新颖的日用品，包括某些耐用的家用电器等等。因此，应把农用工业和农用产品（直接或间接的）作为最优先发展的重点。所谓产业倾斜的政策首先应该倾斜到这方面来。

二、坚持“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大农业的发展方针。过去我们曾经片面地强调“以粮为纲”，排斥“多种经营”，吃过很大的苦头。在改革开始，我们就把家庭经营承包和发展多种经营密切结合，使农村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起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中，离开家庭劳动的积极性和多种经营的潜力是不行的，人们知道，多种经营好处甚多，它使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找到出路；地尽其力，充分开拓我国品种资源丰富的特点；可以积累资金，增加农民的经济收益；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扩大出口产品的来源；可以逐步改变我国人民的食物构成；有利于促进农村的全面建设等等。

三、建立区域性的城乡联合市场。目前全国形成了一些不同规模、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经济区，把条块分割、城乡分割、省区分割的局面初步打破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这种分割屡屡回潮，有的地方互相封锁愈演愈烈。因此，使各类型经济区向区域性的联合市场发展，很有意义。以南京经济区为例。为使其区域内18个地、市的生产要素能合理流动起来，他们互相之间在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条件下，先后形成消费品、物资、金融、科技四大城乡联合市场。从1987年以来3年时间，仅流通经销额则达100

多亿元，物资协作14亿元，组织融资60多亿元，科技交流近2000项，从而促进了区域产业和产品结构的优化。

四、政府要运用强有力的经济手段（税率、利率、汇率等），按照市场供求规律，调节一、二、三产业的价格和收益。长期以来，第一产业（农产品、矿产品），价格很低，无利可图，往往需要政府大量的财政补贴；第二产业（加工业、制造业）增值很大，发展很快，甚至过热；第三产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挣钱太多，获取暴利的多发生在这一方面。这个问题很大。世界市场更是如此。这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大难题。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该下决心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能解决的问题，以显示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五、用高技术改造传统的工业和农业。高技术实质上是一个普及化问题。在经济发达国家里，已经把高技术群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我国当前经济水平和技术力量，首先应大抓信息技术，作为发展经济的主导力量；其次是抓好生物技术，它对改造我国传统农业和医药业至关重要。

六、对工农业劳动者进行大规模经常的专业培训。这既是战略目标，又是当务之急。拿吉林省一个抽样调查材料来看。1988年，吉林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劳动力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838元，高中的664元，初中的568元，文盲半文盲的只有432元。以投入产出比：高中程度的农户为1比7.04，文盲半文盲仅为1比1.67。由此可见，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普及科学技术，是发展现代农村经济的新增长点，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关于企业职工专业培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共识了。马克思在论述社会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时，指出第一位是“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这一点，说明了对全体职工进行持续的专业培训何等重要。

我们必须通过专业培训，把工人农民联合成为现代知识劳动者大军。

七、创立外向型的城乡联合企业。1989年，北京市工农联营企业的出口产品供应额达11亿元，占全市出口供货额1/3以上。这类企业，既有城市大中型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又有乡镇企业机动灵活的体制。为更好地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我们可以探索一种把乡镇企业、小型集体企业、大中型企业联合起来，组成外向型的企业集团（跨国公司）的新的国际化的企业形式。

八、搞好县一级的经济发展布局和综合改革。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农村家庭经营方式的基础上，各种类型的专业户联合体，农工商企业，农业产前产后的服务体系等纷纷涌现。这方面很多问题是一乡一镇所不能解决的。而县则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是包括农、工、商、财、银、税、教、科、文、卫等等各个方面的完整的总体。可以肯定，把全国2000多县的综合改革和综合发展搞好了，我们的现代城乡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就大体写好了。

九、发挥中心城市在城乡协调发展中的枢纽作用。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处在广大农村还难于摆脱小生产（或小商品生产）的环境中，中心城市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中心城市，或是中心城市不能发挥其作用，现代化的事业是

很难实现的。我们所谓中心城市，它的主要特征是拥有贸易、金融和科学技术三大支柱产业，通过它们，把周围城乡的经济网络组织起来，活跃起来。

十、把城乡的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结合起来。近几年来，国际经济学界提出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它的意思是：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同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分不开的。大多数国家，几乎都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这种经济主要是由环境资源的储备构成的，如土壤、森林、矿产、渔场、物种以及水质、气候等等条件。一旦这些环境资源枯竭、退化或污染，社会经济生活就会陷入停滞或受到破坏。因此，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重大经济决策上，不但要满足人们当前的经济需求，还必须同时注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要知道，自然、社会、人类是一个统一体。所以，在全国经济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必须城乡一体地进行全面规划和严格管理。

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

（一九九二年三月）

记者记得，在80年代中期，童大林曾提出，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从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变。他认为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一种共同的普遍的经济发展规律。他还概括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历程：

——从原始社会起，人类开始了产品的交换活动，就有了商品经济的萌芽；

——货币的出现，便有了古代商品经济；

——银行的兴起，进入了近代商品经济；

——金融资本促进了现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高技术将使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

这一次见到他，对改革开放他充满着乐观主义。当话题开始触及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时，他显得兴致勃勃，认为这是当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人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需要发展商品经济，需要尊重价值规律，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摆脱陈旧教条和僵

化观念束缚的革命性开端。而当前，从思想理论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则是加快改革、大胆改革的必要前提。近年来关于新的运行机制的讨论，必然要进一步探讨新体制的模式、内涵和特征。按照辩证法的观点，经济体制是运行机制的质的规定，运行机制则是体制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果体制问题搞不清楚，那么运行机制的确定就容易发生随意性。

童大林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很强调它的实践性。他说，几千年来，商品经济按照它自身固有的发展规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为不同的社会制度所运用。商品经济和不同的社会制度相结合，就具有不同特征。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同商品经济结合起来，至今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需要我们去探索、创造，依靠实践经验逐步形成、发展以至定型。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童大林经常到各地走走看看。当他发现哪个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在改革方面的创造业绩时，总是兴奋不已。最近，他到处赞扬珠江三角洲、苏锡常（苏州、无锡、常州）、山东半岛、闽东南等开放地区，认为它们可以同“东亚四小龙”（即南韩、及台湾省和香港地区、新加坡）竞赛，赶上它们。从我国沿海这四个地区的发展势头来看，它们正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新的希望。

谈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童大林用很肯定的语气说，把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就可以看出这种新体制已经出现雏形了。

这就是说，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其中一条，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雏形的出现。

当记者问及这种新体制有何特征时，他说，这需要经济学界的同志们一起来进行探讨。为着抛砖引玉，他提出了几点简要的看法。

第一，保证和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第二，通过以市场为主导的运行机制，实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良性循环。

第三，在社会主义政权的条件下，各种类型的经济成分和实体，一律平等地参加合法合理地竞争与合作。

第四，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如价格、工资、税率、利率、汇率等）发挥作用，保证全社会利益在企业、家庭、政府之间的合理分配。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主要是发挥其立法、监督、服务的功能。

第五，人民政权的任务，一方面要发挥、保护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一方面要努力消除破坏商品经济正常秩序的消极东西，如破坏社会安定的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以及经济上的不法行为，等等。提倡企业文化、市场文化，树立劳动致富、文明经商、合法竞争、平等自主等等新的道德风尚和意识观念。

（本文作者系《经济日报》记者武小强。刊登于1992年3月3日《经济日报》）